

流变中的流派 ——

刘扬体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流变中的流派

刘扬体 著

『 鸳鸯蝴蝶派
新论 』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变中的流派/刘扬体著.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7

ISBN 7-5059-2687-X

I . 流… II . 刘… III . 鸳鸯蝴蝶派-文学研究-中国
IV . I207. 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1795 号

书名	流变中的流派——“鸳鸯蝴蝶派”新论
作者	刘扬体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潘光武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刷	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223 千字
印张	11
插页	3 页
版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66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2687-X/I · 2011
定价	18. 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，部分「鸳鸯蝴蝶派」小说的封面



奇俠精忠傳



第 二 集
上 海 益 新 書 社 發 行

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

李涵秋著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

人海夢回 第五回



家庭革命
父子絕交

惟有明白旧的，看到新的，
了解过去，推断将来，我们的
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。

——魯迅

专家推荐意见 (之一)

这部书稿是刘扬体同志长期研究的成果，~~已~~基本完稿，却一直在反复修改中。今年初，我看了其中的主要章节，觉得不错。经多次敦促，他才定稿。

本书定名《流变中的流派——“鸳鸯蝴蝶派”新论》，对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坛上这一通俗文学流派，进行全面的考察，并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。它的主要优点是：

一、涵盖面广。对鸳蝴派的形成、发展、兴盛到衰落的过程，作了系统的、追本溯源的叙述，材料翔实丰富；对言情小说、社会小说、武侠小说、侦探小说的主要作家及代表作，分别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，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流派的思想艺术的全貌。

二、有理论深度。作者没有停留于描述的阶段，而是进一步剖析这一流派的思想内涵、艺术成就、他们所追求的独特的艺术功能、他们所受到的时代的推动与新文学的影响，以及自身思想艺术上的不足与失误，并且一一作出理论上的概括、探讨；使人们对鸳蝴派有较为深入的认识，尤其是理解它虽然一直受到新文学阵容的指责批评，却在市民阶层中拥有广大读者

这一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。近年来，有关鸳蝴派的研究开始多起来，但达到这样的理论深度的，还不多见。

三、立论公允。从“五四”到七十年代末的六十多年间，鸳蝴派一直受到文学界、学术界的贬斥冷落，近十多年里，在纠正原先的粗暴简单的倾向时，又出现了毫无保留地吹捧这一流派的另一种极端。本书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鸳蝴派及其作家作品的成就、意义与明显缺陷，作了切实的分析与有说服力的评价。作为一部全面考察总结现代通俗文学得失的著作，本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，对当前的通俗文学创作，都很有价值。所以，在劝说作者尽快定稿付印之后，我也希望院出版基金能够给予经济补贴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研究员 樊 骏
1996年6月17日

专家推荐意见（之二）

刘扬体同志是近一二十年我国研究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知名人士。他发表的文章不多，但全都有分量，成为别人为文引用的权威性理论。他从研究鸳鸯蝴蝶派文学，转而从事电视剧评论，在电视剧评论界有卓越的声誉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将鸳鸯蝴蝶派文学放在整个通俗文学的层面上来研究，就使他比旁的人站得高一些，视野更广阔一些，角度更新一些。

刘扬体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、文艺理论知识的修养，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力，再加之他知识比较渊博，这就使他的研究有着厚实的基础，能够做到厚积薄发，言之有据，言出必新。

就我所知，这部书他写了十余年，已三易、四易其稿。他反复推敲，精益求精，没有新意不拿出来。这种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，是极为可贵的。

本书思路开阔，逻辑严密，论证深刻，见解新颖，文字优美，处处闪现出作者的睿智，有充足的理由说它是一部上乘之作，出新之作。

一、本书除“导言”外，共分八章，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

源与流，形成和发展，兴盛与衰亡，它的思想和艺术的复杂性及其总体特征，它的作家与作品，它和新文学整体的关系，它在通俗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，等等方面，作了全景式的扫描，既有历史的俯瞰，又有细部的精致分析，它是一部独创性的流派文学史。

二、本书新见迭出。如，他认为：通俗文学消费市场的背后，不是金钱而是大众的需要和选择；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不能等量齐观，它们在审美价值定位、创作方法、题材选择、艺术表现形式、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，不应套用同一的评价标准，去评论拥有不同读者对象的作家；新文学作家讳言文稿的商品价值，不屑为兑现这种价值写作，通俗小说家则常常迁就读者，总是依照读者的审美准则、道德取向、流行的美学观念与现存的价值体系处理人物关系，表达作品主题；两种文学彼此都在取长补短，但对彼此的互补性却又长期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。这些深刻的思想，独到的见解，令人信服的论述，无不显示了作者理论修养的深厚。因此本书除了史的叙述脉络清晰外，还具备理论的深度和论证的力度。

三、作者视野开阔，他不仅仅局限在鸳鸯蝴蝶派文学本身，而是在与严肃文学、通俗文化的比较，及当今世界文学走向的分析之中，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，因而显得很活跃，很潇洒。他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同时，又适当地吸收了现代艺术哲学、文化心理学、审美心理学、接受美学、大众传播学等当代美学、文化学和艺术理论，这就使本书处处有新意，不是在陈旧的基础上重复别人，而是总在说自己的创见，在把读者引向新的领域。

因此，我认为本书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建议给予出版补贴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 张大明
1996年6月9日

093151

• 5 •

自序

我研究“鸳鸯蝴蝶派”很偶然。

1980年底，我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。初来乍到，得有一个研究项目。新文学的大家：鲁（迅）、郭（沫若）、茅（盾）、巴（金）、老（舍）、曹（禺），早有不少学者孜孜以求，而且成果累累；于是，接受友人建议，选了“鸳鸯蝴蝶派”这个冷门。

一开始，接触这派文学，尤其是此派早期作品，很容易产生“味同嚼蜡”的感觉。后来，读得多了，所想所感也就多了起来。这时才深自感到，以这个派别为代表的民国以来的旧派通俗文学，实在是一个非常宽阔的领域，不但可读的作品不算少，可研究的东西也很多。所谓“山下千林花太俗，山上一枝看不足”。（辛弃疾：《归朝欢》）世间各门学问由低渐高，由浅入深，情形大抵都如此。

想得比较多的问题是：“鸳鸯蝴蝶派”是一个流变中的流派。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，它的变化很大。这不取决于谁的主观愿望，而是巨变中的历史所使然。这派通俗小说，在题材选

择、写作手法、主题表达、艺术情趣、语言风格、读者对象等等方面，诚然与新文学有许多不同之处，但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学派别，它与新文学一样，也是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土壤的，在历史的大动荡中，也都经受着现实社会矛盾的煎熬与民族斗争的考验，也同样发生过剧烈的变化和分化。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，不但整个流派的倾向和风貌，不同时期有许多变化，属于此派的不少作家的创作，这一时期那一时期也不一样。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家，努力追赶时代潮流，逐步靠近新文学；就连与传统文学联系最为密切的武侠小说，在白羽等人笔下，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变革。既然它在变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派别看得那么死，为什么总是采取轻视、鄙弃和排斥的态度呢？新文学作家把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视为文学的首要任务，对于以追求娱乐性、消遣性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小说，不能认同，甚至无法容忍，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；但即使如此，也应看到其中的确存在着历史的偏见。从“五四”到七十年代末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还那么看，还把以这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，就没有多少道理了。为什么看不到通俗小说有自己的活动天地，营造的是别样的艺术世界，拥有不同的读者群体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构成的是别种文学无法代替的独特的文学景观呢？这短视来自历史设置的障碍，也来自我们自己的偏见。偏见消除了，真理的亮光就会照射进来，让人看到先前看不见的东西。艺术与社会、作品与读者的联系，千头万绪，既复杂又深刻。通俗小说与图书市场的联系的确很密切，但不能以为市场除了将作品商品化而外，竟无别的功能，更不能以为市场是唯一的权威，市场可以自己左右自己。市场万能？没

有这回事。因为，站在图书市场后面，推动它前进的是数量庞大的文学消费者。“大众”不仅意味着一种“量”，也意味着一种“质”，即社会对文学参与性质的关心。你“阳春白雪”，我偏“下里巴人”，后者不买前者的账，大众文化选择中存在着反文化的原则，即反对（包括不理会、不支持）某种文化的“超前性”、“寡合性”。这种“反文化”的力量，也在无形之中推动着新文学的变革。

与流派的流变及历史地位相关的，是对此派作家（主要是代表作家）与作品的评价问题。这些年，“一棍子打死”的学阀作风，已近于绝迹，这是一个大好现象；但，隔靴搔痒、不着边际的批评，和无原则的吹捧，却有所增多。矫枉勿须过正。还是应当实事求是，给予科学的公正的评价，并将评价偏低这个从整体看来依然存在的老问题，首先解决好。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，旧派通俗小说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。他们对于推动我国文学的发展，作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。包天笑、周瘦鹃、张恨水、刘云若、向恺然、李寿民、宫白羽、王度庐、程小青、孙了红等人，为通俗小说的繁荣作出的成绩，是我国文学库藏中的共同财富，他们中有的人为此而以笔作犁，勤奋地耕耘了一生。我们不应忘记他们。

有了这些想法，真要动手写成书，在资料梳理和理论探究上碰到的问题、需要克服的难点很多。情形往往如此：说明某些现象易，系统地说明现象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联系难。再加上我做学问，缺少恒志，常犯“朝学之，夕丧之”的毛病。八十年代中期，刚开始着笔时，常常感到先得跟自己的观念作战。古人说“情来，兴来，神来”，面对着一些作品，我总提不起兴

致，哪来的兴和神呢！当然，更主要的，还是学力不足，资料积累也不够，写来写去，自己很不满意。友人赞我“三易其稿”、“反复推敲”，稿倒是“易”了好几次，自然也有所“推敲”，但更多时候，还是由于写不下去。郑板桥诗云：“作文勉强为，荆棘塞喉齿。乃兴勃发处，烟云拂满纸。”烟云不曾有，荆棘感却时有发生。面对着一个庞杂的流派，个人能力实在有限。

前年岁尾至去年年初，我参加了由我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共同编写的《中华文学通史》（近现代卷）中有关章节（《“鸳鸯蝴蝶派”和张恨水》）的撰稿工作。该书主编之一樊骏同志阅稿后，一再督促我将原先写的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书稿完成。老实说，没有他和张大明同志的一再催促、鼓励，这部书稿大概是无法终篇的。

书名《流变中的流派》，而以“‘鸳鸯蝴蝶派’新论”为副名。因为，在旧派通俗小说中，“鸳鸯蝴蝶派”是个“带头羊”，它资格最老，变化又大，影响所及，把一些未参加过此派的通俗小说家，也“裹胁”进来了。只要写的是通俗类型的言情小说、武侠小说、侦探小说，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看作“鸳鸯蝴蝶派”，虽然不准确，可这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惯例。惯例难违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就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名称问题，贅上几句。这派作者众多，但缺少组织，虽有少数同好成立过团体，但从无明确的组织纲领和系统的理论主张，甚至也没有正式的名称。早期，有人因他们所写作品的内容，大多为才子佳人，卿卿我我，便用“鸳鸯蝴蝶派”来概括，很快得到社会公认；稍后，叫它“礼拜六派”，大家也都接受：这派最出名的刊物是

《礼拜六》，最一致的主张是消闲，这么叫也没错。后来呢，它还在变，还在“流”，该怎么称呼才妥当？我想，文学流派，本来就处在流变之中，它不是政党，不是秘密组织，妍媸美丑无庸隐晦，一切都在它的作品里。名称要有，但不必把它看得太重。对待这个问题，最好的办法还是“约定俗成”。“鸳鸯蝴蝶派”，于戏噱中带着贬意，意思也不完全准确，但得名最早，久而久之，已成为这类小说的通用名称。这就像一个人的名字，大家叫顺口了，熟悉了，可改可不改，还以不改为好。只要关心它研究它的人明白，任何文学流派都处在变动之中，任何名称都仅仅是一种标记，不把注意力拘执在这上面，也就行了。

刘扬体

1996年11月1日

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

刘扬体 男，1934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。1963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，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现代文学研究。现为该所研究员，并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兼职研究员、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客座艺术指导、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会员。